

李菁／著

解读运河

——大运河与唐代社会深层关系之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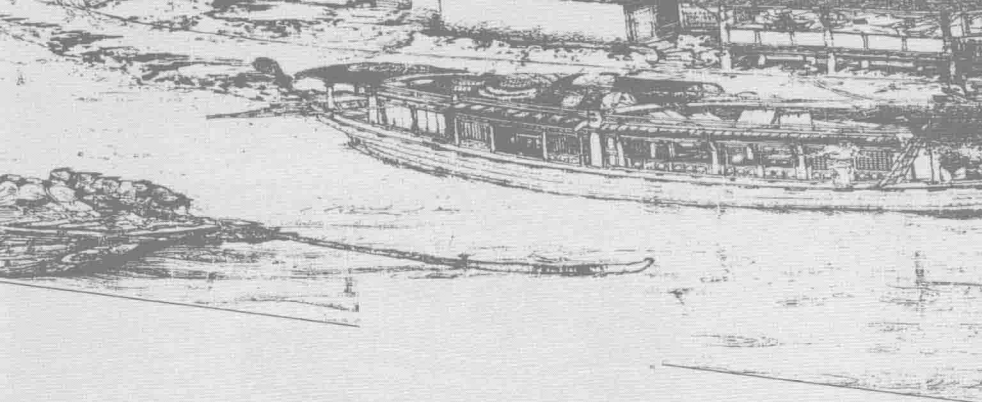
DAYUNHE YU TANGDAI SHEHUI SHENCENG GUANXI ZHI KAOCHA

解读运河
JIEDU YUNHE



文人笔下的运河，洋溢着浓郁的市民文化氛围，
草市夜市、商人歌女、街头攘攘、人声鼎沸的情景描写频频出现。
在文人眼里，运河依然是一条活跃而流动着的市民文化带，
而形成这条文化带的背景，
正是中唐以后江淮工商业的日益发展、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

厦门大学出版社



——大运河与唐代社会深层关系之考察

DAYUNHE YU TANGDAI SHEHUI SHENGENG GUANXI ZHI KAOCHA

解读运河

李菁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运河/李菁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6
ISBN 7-5615-1560-x

I. 解… II. 李… III. 大运河-研究 IV. 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164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200 千字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文人笔下的运河，
洋溢着浓郁的市民文化氛围，
夜市夜市、商人歌女、街头攘攘、人声鼎沸的情景描写频频出现。
在文人眼里，运河俨然是一条活跃而流动着的市民文化带，
而形成这条文化带的背景，
正是中唐以后江淮工商业的日益发展、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

序

郑学檬

李菁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付梓,请我写一点意见,权作序言。我想说的话有三点:一是关于本书的选题;二是关于本书的创新;三是关于本书的风格。

关于本书的选题。李菁同志于1994至1997年师从中文系吴在庆教授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毕生后工作了几年,才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时我对她的信心不是很足,因为学科差异较大。我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虽然说文史不分家,但学术有专攻,不可事事兼济。我试图找到我们学术上的共同点,否则难以完成指导任务。我先是建议她做唐代江南经济和文化的研究,试图从物质文化生活的深度开掘,发现唐代江南文化上的底蕴。她根据我提出的书目,开始阅读与思考。大约一年以后,有一些感觉,但是仍找不到清晰的创作思路。我开始动摇了,她似乎也有点困惑。经过几个月的停顿之后,我转向另一个角度,即建议她运用比较熟悉唐代文学史的长处,集中在唐代诗作中找题目,把一年多来掌握的唐史资料(特别是唐代江南经济史资料)溶入到研究中去。经过多次商量,最后确定围绕运河展开这项研究。《解读运河》一书就这样在讨论和探索中孕育并写成了。虽说因为时间关系,未能处处如愿,但毕竟找到了一个符合李菁自己学术素养的题目。“广疏便门”,“如舟沿川”(刘禹锡诗句),即是成功了一半。

关于本书的创新。人文科学博士论文的创新模式应不同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法律、经济等),主要看它是否发掘出同行所未重视或并不知晓的观念与思想,借此解剖一个时代一部分人的

“精神生活”(Inner Life)。李菁博士朝这个方向努力,获得了不少的成功。她在本书第三章“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中,对饮茶的人文意蕴作了探索。她写道:皎然的茶诗“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不仅道出了僧人与茶的特殊关系,而且有意无意间,以菊香、茶香点缀出些许高洁、脱俗之趣。”饮茶在僧人看来,不仅为了提神,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饮茶已由物质生活转变为精神生活。本书通过咏叹运河的诗文,探讨文人价值观的转变,或有言人所未言者。另一方面,本文不避风险,介入隋炀帝修运河的评价,其立论自与我的观点有关,但又有新的补充。像许棠的诗作“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所思千里便,岂计万方忧?”可以说彻底否定了唐人对隋炀帝修运河的定论。这一章的分析告诉我们:客观地评价历史问题需要时间,所以有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总之作者在探索中开掘,有不少新意。

关于本书的风格。因李菁博士是学中文出身,所以文字叙述,如行云流水,加之引用了很多唐诗诗句,更是“汪洋恣肆”,一泻笔端。我一向遵循“文无成法”的原则,主张做博士学位论文也要有个性,不要一个面孔。本文因作者的素养与选题、选材关系是满足了我的要求,所以有些许赞赏,事亦必然。

李菁博士出版这本书,标志着她作为一个有文史兼通经历的年青学者开始了艰辛的学术探索长征。露往霜来,其道也远,有厚望焉!

2003年4月12日

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点涛斋

前言

提起运河,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长城。不过,修筑长城为的是限戎马之足于塞外,而开凿运河,却是为了沟通经济文化于南北。二者同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奇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长城意味着关锁,运河意味着开放——然而他们却能在1 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彼此并行不悖。这种和谐共存吸引了无数学人注视的目光。对于长城究竟成功地阻挡过几番草原铁骑的南下、为封建王朝提供了多少安全保障,本文暂不作论述,引起作者兴趣的是这条世界上最古老、航线最长、贯穿南北、曾经作为封建国家漕运大动脉的大运河。

大运河全线开通是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呈南北向,改变了中国主要河流几乎都呈东西走向的基本格局。它流经全国经济发展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江淮地区,对封建王朝的漕运事业以及改变南北经济格局、促进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均有着难以估量的贡献,正所谓“功在当代,惠及长远”。有唐一代能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时期,与其最早承运河之惠是有相当密切之关系的。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工商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商业行为日益普遍化以及商人阶层的涨大,促进了社会时尚、文化思潮甚至于朝廷制度的变革。也是在这一时期,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东南地区日益为封建国家所倚重,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成为维系朝廷命运的重心,满载粮食以及各类物资、商旅、游客、学子的船只日夜在运河上热闹地行驶着。对于唐代及其后封建国家的经济发展、南北文化交流乃至种种社会变革,运河都是不可替代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众所周知,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不是阴谋、颠覆、刀光剑影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而是文化的积累和技术发明,是不断进步的哲学和技术力量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唐代而言,也是如此。唐初,由于高祖和太宗明智的养民安民政策,国家很快便走向稳定富强。但高宗以后,这种富足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比如关中开发过度,自然环境被破坏影响到农业的发展;人口激增,尤其是不从事劳动的官僚阶层日益膨胀,需要百姓养活的官兵越来越多;皇族生活日渐奢靡,导致各类费用倍增等等,仅关中一地,已远不能负担这笔巨额的开支。于是,大运河开始备受瞩目,漕运事业逐渐为国家所倚重。换言之,隋炀帝修凿好的这条当时主要用于帝王出巡的人工河道,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发挥它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确切地说,大运河的作用在唐代可以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弥补关中、河南(主要指东、西两京)经济之不足,加强了唐王朝政治中心与江淮经济发达地带之间的联系,使王朝得以在安史乱后再维持一个多世纪。这是运河的政治意义所在,为封建政府所密切关注,漕运是其外在体现。其二,对南北方起着很好的沟通作用,具有改变中国历史上南北经济布局的划时代意义。所谓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运河打破了南北两地因交通不便而产生的较为隔膜的状态,使大一统国家各地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融合的步伐也因之加速,并进而使人们在思想、心态、乃至价值观念上发生变化,作出调整。运河在这方面的功能不受政治力量的控制,

官方史籍中也罕见特别记载,但在文化传承史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本文所要解读的便是这第二种意义上的运河。

隋唐大运河是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注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与之相关的专著和专论颇多。如日本青山定雄的《唐宋汴河考》、张崑河的《隋运河考》、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潘镛的《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著的、将实地考察、文献资料和科学分析成功结合起来的《运河访古》、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以及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等。从这批学术成果来看,学术界对隋唐运河的研究大致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研究唐代漕运为主,将漕运状况的变化与大唐帝国国运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漕运直接影响到唐帝国的盛衰,全汉升的专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中,作者在分时段论述唐代漕运的发展变化状况之后,得出结论:当运河能将作为政治、军事重心的关中与作为经济重心的江淮密切联系起来时,唐帝国便名符其实地凝结为一个坚强的整体,如高宗、玄宗时期以及宪宗元和中兴时期;而当运河因战乱被阻,无法很好地将这两个重心联系起来时,帝国就要面临中衰甚至崩溃的命运,如肃、代、德三朝、穆宗以后直至唐末。简言之,漕运的畅通与停滞直接关涉到唐帝国命运的盛衰隆替。这一观点也体现在潘镛的《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但潘著对隋唐运河的渊源及开发利用另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如该书形象地将唐朝修整运河各河段的几项大工程概括为“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和“三治江南运河”,使这一资料较为分散的历史问题条理化。

其二,着重于考察隋唐运河尤其是汴河的流经路线。如日本

青山定雄的《唐宋汴河考》(《东方学报》(东京)2,1931)指出,《通鉴》记载先入泗水、再入淮河的是隋以前的运河路线,而通济渠则是由黄河直接流入淮河,较之隋以前的水道更短、更直接。邹逸麟的《隋唐汴河考》(《光明日报》1962年7月4日)一文以《元和郡县图志》及各种方志为依据,也证明隋唐汴河不入泗水,而是自开封以东循睢水之南的惠济河,折而东至宁陵县南入睢水,再循睢水过宋城之南至谷熟北,以下则循蕲水故道,经永城、宿州、虹县,至泗州临淮县入淮。马正林的《唐宋运河述论》、刘希为的《隋通济渠流经路线辨析》(均收入《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两篇文章,对于汴河直接入淮还是先会泗后入淮这一学界争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文同意直接入淮说,但认为汴泗道在唐代也可通航;刘文则以大量史料说明唐代汴河是先在徐州会泗水,然后再向东南注入淮水。直至唐后期,汴河才改线南移,经商丘、永城、甬桥、灵璧入淮,成为唐后期的主要漕运航道,但汴泗线仍同时通航使用。此外,陈正祥所著《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一书中的“汴河”部分也谈到汴河流经路线问题,其所持观点是汴河无须经过徐州,而是直接入淮。

其三,运河对其流域区地方经济、城市发展的影响。如单永玉的《通济渠的产生及其综合利用》、蒋福亚的《三吴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江南河的开凿》、何荣昌的《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李志庭、楼毅生的《运河与杭州》(以上诸文均收入《运河访古》)及周怀宇的《论隋唐淮河流域商业发展》(《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9月第5期)一文等,都论述了运河通航对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如何荣昌文,详细论述了唐宋运河通航后,对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的开发,灌溉事业的发达,耕地面积的扩大,湖田、圩田的开辟,都与

运河息息相关。该文还指出,江南造船业的发达、常州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的发展以及扬子、瓜洲等市镇的兴起也都有赖于运河的开通。此外,史念海的《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一文分别对唐代运河沿岸的汴、宋、徐、楚、扬、润、常、苏、杭等主要都会作了简单而扼要的介绍。傅崇兰所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则详细阐述了运河沿岸主要城市发展沿革的历史,书中对扬州、苏州、杭州三座城市的演变进程均有专章介绍。这类专著或论文在运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这一观点上均保持一致,唯角度各自不同。

第四,研究运河文化,开辟出隋唐运河研究的新领域。这批论著中首推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第二编“隋唐时期的运河与运河文化”在总结运河与唐帝国兴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运河对区域经济的巨大影响、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繁荣等诸问题之外,更集中笔墨,从文化的角度,运用大量史料,阐述了隋唐时期运河区域的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科技成就、宗教、民俗以及运河区域的南北与中外文化大交流等问题。该书指出:隋唐运河文化不仅包括北方地区的黄河文化也包括南方地区的长江文化,由南北文化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而形成。这种新型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仅吸收国内各地的文化精华,也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这部著作可谓填补了学术界运河研究的空白。其他研究运河文化的成果还有田秉锬的《〈金瓶梅〉与运河文化》(《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梁白泉的《初论运河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王沂的《中国戏曲与运河文化》(《艺术百家》1995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文分

别揭示出运河文化的极权化、贵族化、交融性、开放性等特点,但都不是专门针对隋唐运河这一论题而言,因而仅供参考、比较而已。

以上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研究隋唐运河的四个主要出发点。这四点可以说几乎涵盖了这一论题的全部,对日后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但同时,也对这一论题的深入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笔者尝试着从文史结合的角度来研究隋唐大运河,即把运河作为一个中介,一头是唐代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头是唐代文化的丰富多样化、文人观念的逐步调整,二者通过运河这个中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解读运河经济意义的基础上,探究历史本源、挖掘历史深意,肯定大运河的历史贡献,并进一步分析这种背景之下唐代文人内心世界的嬗变。运河是一个窗口,本书透过这个窗口,来看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从文人的视角,探究大运河与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关系,比如说江淮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情况,夜市的情况,南北两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生活环境的变化,运河通航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等等,这些都用运河这个中介连贯起来。在具体写作时,本书从文人诗作入手,尝试着从形象思维的层面去研究历史进程,以诗歌为论据,写文人眼中的经济、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再透过这些相对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反观文人内心世界的变化,从而将文化、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来解读运河的经济意义、文化意义,这是笔者所作的尝试,因此本书中定有不少不足、不当之处,希望能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评和指教。

本书用两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文人诗文(主要是诗歌)中所见唐代粮食、布帛、盐及茶叶在运河上的转运,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一些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挖掘出诗歌中所包含的历史深意,从中

可以明显看出大运河对唐代南北经济的沟通作用。这两章还分别对南粮北调问题、饮茶风俗北渐问题简要地发表了一己之见。运河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四章。该章主要是从诗歌中寻找唐代文人遗留在运河上的足迹,包括他们对南方经济发展的描写,对南方文化的欣赏与接受以及他们在运河及其沿岸城市的生活(主要通过“乐游”和“伤离”来体现)。本书认为,文人笔下的运河,洋溢着浓郁的市民文化氛围,草市夜市、商人歌女、街头攘攘、人声鼎沸的情景描写频频出现。在文人眼里,运河俨然是一条活跃而流动着的市民文化带,而形成这条文化带的背景,正是中唐以后江淮工商业的日益发展、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

探究历史本源,挖掘历史深意,是本书所希望达到的更高层次。因此,本书在最后一章作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从唐人评说炀帝开河谈起,通过对比唐代政治家和部分文人对隋炀帝开河这一史事的不同态度——对运河只字不提与充分肯定开河之功,以及文人诗作中商贾形象的变化,以期尽可能地还历史以本原,并进而分析中晚唐部分文人思想观念的多样化与价值倾向的调整。本书认为,正是因为中唐以后,一些文人开始游离正统的儒家济世思想,不再只以“君”、以国家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而是开始由过于激进的政治进取和道德自励转向较为温和平实的人生态度,开始从“我”出发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文人眼中才可能出现一个较为全面的隋炀帝形象、才可能更公正地看待炀帝开河这一史事;同样地,以平静而平等的态度,力求客观地描写商贾,贵本而不贱末,重义而不轻利,也是文人人生价值观发生嬗变的反映。基于此,本书在第五章之后特别增加了第六章,对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作了更为具体些的阐述,以期对这一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笔者师从唐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郑学檬先生,受益匪浅。导师

博学广闻、才思敏捷,每一次与导师哪怕是短暂的几分钟闲谈,都能使我有耳目一新、思路顿开的感觉。这本小书在写作过程中,选题、方法、观点乃至资料的收集,都无不倾注着导师的心血!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吴在庆教授,也对本书的进展给予了关心和指导。从一段短小的引文到通篇论证是否得当乃至初稿的审阅,导师都提出了相当中肯的意见,且不厌其烦。求学路上能得到两位恩师无私的帮助,乃是笔者今生最大的荣幸!谨以这本小书献给两位恩师。

李 菁

2003年6月于厦门大学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隋唐运河概述	(1)
第一节 隋大运河的开凿	(2)
第二节 唐对大运河的维护与疏治	(10)
第二章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17)
第一节 唐代漕运概述	(17)
第二节 南粮北调——唐代大运河价值的集中体现	(22)
1. “帆影咽河口,车声聒关中”	(26)
2. “河朔人无岁,荆南义廩开”	(29)
3. “任转江淮粟”,“养我防塞兵”	(31)
4. “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	(33)
5. 南粮北调的深层含义	(36)
第三节 布帛与盐的转运	(38)
1. 布帛的转运	(38)
2. 盐的转运	(42)
第三章 “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47)
第一节 唐人贵茶,南风北渐	(49)
第二节 北人贵茶原因之一——佛教的影响	(52)
第三节 北人贵茶原因之二——文人的推崇与宣扬	(55)

第四节 北人贵茶原因之三——江淮种茶业的迅速发展	(60)
第五节 大运河——饮茶风气的北渐之路	(66)
第四章 运河行旅	(74)
第一节 文人所见汴河之社会经济	(79)
1. 汴河上的重镇——汴州	(82)
2. 宋州、泗州及其他城镇	(87)
3. 灯火酒楼淮阴城	(91)
第二节 文人所见邗沟之经济	(94)
1. 淮水东南第一州	(94)
2. 春风十里扬州路	(96)
第三节 文人所见江南河之经济	(100)
1. 农业欣荣	(101)
2. “市”的兴旺	(104)
3. 物产丰富	(106)
4. 义兴茶盛	(108)
第四节 运河行旅	(110)
1. 乐游	(110)
2. 伤离	(115)
3. 文人笔下的唐代运河——一条流动的市民文化带	(117)
第五章 探究历史深意——从唐人评说隋炀帝开河谈起	(121)
第一节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121)
1.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124)
2. “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	(125)

第二节 商贾形象在唐代文人诗歌中的变化	(130)
1. 中唐以后社会上的重商现象	(130)
2. 商贾形象在唐人诗作中的变化	(134)
第三节 关于白居易诗《盐商妇》	(138)
1. 中唐盐业政策概述	(139)
2. 盐商在唐代的特殊地位及《盐商妇》中的揭露	(142)
3. 从白居易的重商态度看中唐文人对这一问题的 价值倾向	(145)
第六章 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之转变	(150)
第一节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151)
第二节 澡灌心垢与以静求治	(153)
第三节 三教融会与思想多元	(159)
第四节 本末观的变化与逐利思想的出现	(163)
1. 本末观、贫富观的变化	(164)
2. 逐利思想的出现	(166)
附录	
一、《试论隋炀帝诗歌的清奇风格》	(173)
二、《陆龟蒙所见晚唐太湖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179)
三、《“兼济”抑或“独善”——论司空图晚年心态的 内在冲突》	(189)